

# “欧洲之父”的思路 及其对亚洲的启示

崔之元

1988年,法国总统密特朗发布行政令,将让·莫耐(Jean Monnet, 1888—1979)的骨灰迁入位于巴黎拉丁区的雄伟的“先哲祠”(Pantheon)中。从此,莫耐与卢梭、雨果等为法国和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,永远地安息在一起。

莫耐有何等业绩,使他得以和卢梭、雨果并驾齐驱?

1888年11月9日,莫耐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农村小镇,该地名叫Cognac,出产同名的白兰地酒。1914年前,莫耐在他父亲经营的酒厂负责销售工作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莫耐的人生道路。下面是他的履历表<sup>[1]</sup>:

1914—1918年:作为法国代表参加位于伦敦的“国际供应委员会”,负责协调英、法两国的军需品供应,以免军火商从两国的不合作中渔利。

1919—1921年:担任巴黎和会所成立的“国联”(The League of Nations)的副秘书长,亲身深刻体验了大国权力政治下的国际组织的脆弱性。

1922—1926年:应父亲要求,返回家乡经营白兰地酒。

1927—1938年:1927年初,应波兰籍的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路德维格·拉赫曼(Ludwig Rajchman)的要求,参与旨在稳定波兰货币的国际银行团贷款活动,从此步入投资银行业,1929年在旧金山任“美国银行”副总裁时亲身经历了“大萧条”,成为罗斯福“新政”的国际上的积极支持者。

1934年11月13日:莫耐和希尔维亚(Silvia Gannini)在莫斯科结婚。希尔维亚是意大利人,已婚,而当时意大利法律是不许离婚的。故莫耐和希尔维亚选择在婚姻法上最自由的苏联,同时办理离婚和结婚手续,从而体会到社会主义使个人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初衷。

1938—1940年:法国政府命莫耐负责秘密向罗斯福政府购买战斗机。

1940—1943年:邱吉尔任命莫耐为“英国军需供应委员会”驻美成员。莫耐游说美国各界参战,并为罗斯福的动员演说提供了著名的“民主的武库”(arsenal of democracy)一词。凯恩斯曾说,莫耐使二战“早结束了一年”。

1943—1945年:1943年2月至10月,莫耐作为罗斯福特使,在阿尔及利亚(法属殖民地)协调北非战场的指挥问题。从此,他开始和戴高乐等人一道,筹建战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。

1946—1950年:1946年1月,戴高乐任命莫耐为“法国计划

委员会”(Commissariat du Plan)第一届主任。莫耐提出了著名的“指导性计划”概念。这是他总结了30年代大萧条(导致“自由放任”经济哲学的破产)和过于僵硬的苏联式“指令性计划”两方面教训的产物。同时,“莫耐计划”(Monnet Plan)直接影响到“马歇尔计划”的构思。<sup>[2]</sup>

1950—1955年:莫耐提出并起草了建立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的方案,该方案由法国外交部长舒曼(Robert Schuman)于1950年5月9日正式宣布,故史称“舒曼计划”。1951年4月18日,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正式成立,莫耐担任其“最高权威”(“High Authority”)的首届主席。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迈出了走向“欧洲共同体”和今日“欧洲联盟”的实质性的第一步。故莫耐获得了“欧洲之父”之称。

1955—1979年:1955年6月,莫耐在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的任期结束。他随即通过广泛的个人关系,建立了“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”(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),其成员为欧洲若干主要政党和工会的代表。多年来,该委员会为欧洲统一提供了许多重要建议,包括欧洲原子能机构、欧洲货币基金等等。

1976年4月1日,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做出决议,授予莫耐“欧洲荣誉公民”的称号。迄今为止,他是唯一享有这一称号的人。

从这份履历表中,我们看到,莫耐的一生几乎和20世纪的每一重大事件都联系在一起。但使他名垂史册,堪与卢梭、雨果并驾齐驱的业绩,是他为创建欧洲联盟做出的突出贡献。下面,让我们来分析莫耐1950年提出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的原因及其深远意义。

## 黑暗中的跳跃

在莫耐看来,二战后欧洲重建的两大关键,一是德国问题,二是欧洲和美国的平等关系问题。而这两大问题的妥善解决,都有赖于统一的欧洲联盟的建立。

关于德国问题,一战后曾为“国联”副秘书长的莫耐,深知绝不能在二战后再像一战后那样来处理德国问题。但对深受二战创伤的欧洲各国(特别是近邻法国),德国重新振兴又的确是巨大危险。因此,一方面,必须对德国平等待之,不再像一战后那样将其“逼上梁山”;另一方面,必须把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置于

“欧洲共同体”的大制度框架之内。

关于欧美关系,莫耐认为,“欧洲不能长期在资金和军事上依赖美国。这样做,对双方均有害无益”。<sup>[3]</sup>而只有建立强大的欧洲联盟,欧洲各国才有可能与美国平等对话。否则,正如曾任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所说,欧洲在二战后成了美国的“半殖民地”。<sup>[4]</sup>

但是,尽管许多欧洲人都认识到欧洲联盟是处理“德国问题”和“欧美关系”的关键,欧洲联盟却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这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:

第一,二战后许多欧洲联盟的构想,仅仅是指“政府间”(intergovernmental)合作,而不涉及“超国家”(supranational)构成或联邦(federation);如1948年海牙会议建立的“欧洲委员会”(Council of Europe),各国都有一票否决权,不受“多数决定”原则的约束,故谈不上实质性的欧洲联盟。

第二,美国虽然出于制约德国和苏联的考虑,支持欧洲共同体的建立,但却主张由英国来领导欧洲。这既是由于英、美传统的“特殊关系”使美国对英国领导下的欧洲较为放心,又是由于英国受战争破坏较小,经济实力相对法国较强。然而,英国留恋昔日世界帝国的地位,不愿参加和领导欧洲联盟。这一点,时任美国国务院计划局局长的著名战略分析家乔治·凯南(George Kennan)看得清楚。他认为,一方面,美国应支持欧洲共同体的建立,以防德国在幕后与苏联做交易;另一方面,必须由法国取代英国成为欧洲的领导。但是,据凯南回忆录,直到1949年底,美国务院西欧局仍然坚决反对他的意见。<sup>[5]</sup>

因此,从二战结束后直至1950年,欧洲联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用莫耐的话来说,欧洲还处在“黑暗中”。他认为,欧洲联盟不可一蹴而就,而应首先取得局部的、但同时是实质性的突破。这就是“黑暗中的跳跃”。它既需要机遇,又需要善于抓住机遇的人。

1950年初,机遇终于到来了。

1950年春,像往年一样,莫耐在阿尔卑斯山区步行两周,集中静思欧洲的前途。1949年以来的几个重大事件及其关系是他思索的焦点。

第一,冷战升级。苏联刚刚实验成功首颗原子弹,美国的“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”文件(NSC-68)决定在美国和西欧全面重新备战(rearmament),特别是重振西德。

第二,美国从1948年秋季开始进入经济萧条,一直延续到1950年初,1950年2月失业率高达7.6%。由于这是二战后的第一次萧条(recession),对美国和欧洲的信心冲击颇大。人们不得不想,当1952年7月“马歇尔计划”按期结束后,欧洲经济将怎么办?期待美国国会延长马歇尔计划是绝无可能的。<sup>[6]</sup>

第三,美国萧条一直影响美国的进口,减少了美国对整个英镑区(Sterling Area)的原料需求。英国被迫于1949年9月进行二战后的第二次贬值(第一次是1947年)。在此稍前,英国为维持英镑汇率,向“欧洲经济合作组织”(OEEC,即后来OECD的前身)申请多用“马歇尔计划”中给英国的配额,引起欧洲其它国家的不满。美国开始对英国领导欧洲的能力产生怀疑。

第四,1949年6月,“联邦德国”政府在波恩成立。西德政府要求法国归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让给法国的萨尔地区。德国钢铁工业发展潜力巨大。1938年时德国钢铁产量为西欧的40%,但1949年西德钢铁产量仅为西欧的18.2%。<sup>[7]</sup>不难想象,美国因冷战而重振西德的方案,将迅速使西德至少恢复到战前的钢铁产量水平。法国公众舆论开始担忧德国威胁的重演。

莫耐敏锐地感觉到,上述这四种因素的相互作用,给法国提供了提出新创意、从而成为欧洲联盟领导的机遇。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允许西德重振经济与备战,但仍不可能对西德马上完全放心;而英国1949年9月的贬值使美国不再对英国领导欧洲抱有希望。新成立的联邦德国也会愿意通过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联盟,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尽早摆脱盟军的占领。因此,由法国提出新的欧洲联盟方案,建构1952年马歇尔计划结束后欧洲的的制度框架,正当其时。

想到此处,莫耐迅速返回巴黎,与助手立即起草了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的方案(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),其要旨是将法、德煤炭和钢铁资源共同置于一个“超国家机构”的监督管理下,同时邀请其它欧洲国家自愿参加。他认为,这一方案的妙处,在于美、德各自出于不同动机,均能够接受。<sup>[8]</sup>同时,它在局部经济领域实行了“超国家机构”的监管,形成二战后欧洲联盟进程的第一个实质性飞跃。

1950年5月9日,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前往伦敦参加美、英、法三方会议之前宣布,法国愿以平等精神,不附加前提条件地与西德协商成立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,并欢迎其它欧洲国家参加。1951年4月18日,法国、西德、比利时、意大利、卢森堡、荷兰六国正式签署了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的协议。尽管协议实际执行过程与莫耐的草案有所区别,但总的来说,坚冰已经突破,航道初步开通,更广泛的欧洲联盟的前景出现在地平线上。

莫耐的“局部但实质性的突破”之所以能够实现,固然和他与美国许多政治家在新政时期的历史渊源有关(如美国驻德国最高代表约翰·麦克劳伊(John McCloy)就曾说“欧洲煤钢共同体”相当于开国新政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<sup>[9]</sup>);但更重要的,是因为莫耐善于抓住时机,在1950年错综复杂的国际事件中理出头绪来。他不求一步到位,而是提出为各方均能接受的局部方案;但是,一旦局部方案被接受,在更大范围内就会逐步发生实质性变化。正因如此,曾参与“马歇尔计划”的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(Albert Hirschman)将莫耐的战略思想称为富于“理性的愿望”(thinkful wishing)<sup>[10]</sup>,以和不现实的“一厢情愿式思维”(wishful thinking)相区别。

### 对亚洲的启示

尽管1950年的欧洲与今天的亚洲有着相当不同的内外部环境,但莫耐的“局部实质性突破”思路对亚洲各国合作的加强仍颇有启发。

当前的亚洲金融危机,完全显示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脆弱性。从1995年底开始,鉴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教训,东南亚

各国中央银行间签署了美国国债回购协议(中国人民银行也参加了),但由于涉及资金太小,所以,完全不足以在1997年泰国危机爆发前后发挥任何作用。日本政府在泰国危机后提出了“亚洲基金”的方案,拟设立一千亿美元的资本金,日本出500亿,其它亚洲国家出500亿。但是,以日本一家控制的“亚洲基金”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的反对。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出于自身的动机,不同意“亚洲基金”的设立。

然而,日本的“亚洲基金”方案不合理,并不等于说“亚洲基金”是不应建立的。鉴于美国国会批准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款的极端困难,连美国财长鲁宾最近都对日本1998年又提出300亿美元的“亚洲基金”方案,表示了与1997年的坚决反对略有不同的态度。<sup>[11]</sup>

事实上,在1997年中国对东南亚危机的40亿美元支持贷款中,有30亿是用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金支出的。由于中国在182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本仅占总股本的2%,故中国对自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股本的控制,并不见得比一个设计合理的、不以日本一家独控的“亚洲基金”更多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已经提出了新的“亚洲基金”建议。<sup>[12]</sup>“亚洲基金”将补充,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救助。它能进一步稳定市场信心,并给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提供多元化的视角。鉴于日本及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的外汇储备依次居世界最前列,一个设计公平合理的“亚洲基金”方案,不是不可能产生的。我们不应忘记,不论是1950—1958年的“欧洲支付联盟”(EPU)还是1979年以来的“欧洲货币体系”(EMS),一开始筹建时,均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政府发生过摩擦。<sup>[13]</sup>

此时此刻,亚洲合作的障碍不在物质方面,而在精神方面。我们呼唤“亚洲的莫耐”的出现。(截稿日期:1998年10月19日)

注释:

[1] 本表由本文作者根据莫耐自传(Jean Monnet, “Memoirs”, Doubleday & Company, INC, New York, 1978)和莫耐传记(Francois Duchene, “Jean Monnet: 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”,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New York, 1994)编写。

[2] 马歇尔本人说,“马歇尔计划”是放大的“莫耐计划”。见“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”, 1947, Vol. , June 12, 1947, pp. 249 - 251.

[3] Monnet, “Memoirs”, 同注[1],第272页。

[4] 引自 Michael Hogan, “The Marshall Plan”, p. 94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7.

[5] George Kennan, “Memoirs 1925 - 1950”, London, 1968, p. 453

[6] 美国国会一开始就不情愿批准马歇尔计划。1947年12月,“马歇尔计划”送交国会讨论后,国会做了两项重大修改。第一,限制国务院管理“马歇尔计划”的权力,而新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(“经济合作管理机构”);第二,不将援助资金一次审查批准到位,而是每年审查一次。见 Fred Block, “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”, P. 87, 1997, 加州大学出版社。

[7] Alan S. Milward, “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, 1945 - 1951”, P. 371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4.

[8] 简略地说,美、法均以此制约西德;而西德则以此早些摆脱盟军对其钢铁基地(鲁尔地区)的联合控制。

[9] 引自 D. Brinkley and C. Hackett 编,“Jean Monnet: The path to European Unity”, St. Martin Press 1991, P. 139.

[10] 见 Albert Hirschman, “Essays in Trespassing”, p. 267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1.

[11] 见 New York Times, October 4, 1998. 鲁宾说日本的提议是“建设性的”,但主要应先将本国经济启动。

[12] 见1998年7月21—23日联合国在纽约召开的“专家组会议”(Expert Group Meeting)文件。

[13] 见 Jacob Kaplan and G. Schleiminger, “European Payments Union: Financial Diplomacy in the 1950s”, Oxford, 1989.

(作者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、博士)